语言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变体的存在与发展

陈 茜
(湖北经济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英语变体在中国已经存在三百多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变迁对中国英语变体的演化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概述英语变体在中国的简要历史,并按照语言生态学的观点分析英语变体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方向。

关键词: 英语变体; 中国英语变体; 语言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 H31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6)02 - 0197 - 06

On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of Language

CHEN Q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

Abstract: English varieties have existed in China for some three hundred years, on which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have exerted an enormous impact. This paper briefly touches upo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varieties in China to begin with,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ableness of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varieties of English and the prospect of their development.

Key words: English varity; Chinese varity of English; ecology of language

近年来,对中国英语变体的研究蓬勃发展,其观点众说纷纭,纷繁复杂,学界不少人尝试结合不同学科从多方面进行探究,取得了许多成果。笔者认为,以语言生态学的视角分析研究中国英语变体的产生、变化与发展,也应该是一个合理有效的切入点。据此,本文试图从语言生态学的角度探讨中国英语变体。

一、中国英语变体的简要历史

"语言变体"是指现实生活中言语在发音、语法或词汇等层次上发生的内部差异,可分为地域变体(regional variation)和社会变体(social variation)两种。[1] "语言变体"是一个内涵很宽泛的概念,大至一种语言的各种方言,小至一种方言中某一项语音、词汇或句法特征,只要有一定的社会分布范围,就是一种语言变体。[2] 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英语语言变体或称为英语变体的是指英语在语音、语法、语义和语用上的差异变体,如不列颠英语(British English)、美利坚英语(American English)、加拿大英语(Canadian English)、澳大利亚英语(Australian English)、印度英语(Indian English)、南非英语(South African English)、新加坡英语(Singaporean English)等。虽然这些英语变体的某些言语形式同时体现了一定的社会

收稿日期: 2015 - 11 - 12
作者简介: 陈 茜(1979 -),女,湖北武汉人,硕士,湖北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变体特征,但总体而言它们都应属于地域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共同特点是:(1)都是通过教育系统得以发展的;(2)在英语变体流行的地区,标准英语通常不通用;(3)是一个地区内被用来交流的工具;(4)已经被本土化。[3](p3)

纵观英语语言史,英语变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出现,主要缘于说英语民众的移民潮以及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开拓。在 16 – 17 世纪,英国人向美洲和大洋洲移民,由此产生了北美英语和澳洲英语等英语变体;在 17 – 18 世纪,英国对亚非国家的殖民拓展也使得英语成为英国控制当地民众思想言论的重要手段和文化渗透的主要工具,由此便产生了印度英语、南非英语等由殖民统治行为导致的英语变体。而中国英语变体(Chinese Varity of English),从广义来说,指的是被具有中国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使用,带有汉语语言和文化特征,能完成语言使用目的,并被其他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英语使用者所接受和认同的英语变体。英语在中国的变体最早产生于 17 世纪中期中国广东沿海地区。在 1637 年,最早一批英国商船抵靠广州,为方便和英国人做生意,当地的中国商人与买办开始使用不标准的英语与英国人交流,这种英语后来被称为广州英语或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广州英语的特点是词汇量小,不讲究语法和句法规则,语音被简化,是由专门词汇、粤语之音、汉英模式杂糅起来的口头交际语言。[4,5] 至于后来影响更大的上海"洋泾浜英语(Yang King Pang English)",在英语变体中,等义的说法是"皮钦英语(Pidgen English)"。"皮钦英语"指的是由不同语言混杂而成的混合语,为不同语言人群相互联系和交流所用。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上海迅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上海洋泾浜英语(Shanghai Pidgin English)成为当时中国变体英语的主要代表。总体而言,上海洋泾浜英语与广州英语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上海方言标注的英语发音,并且词汇量较后者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在中国其他口岸城市也出现了各种带中国方言特征的"中国口岸英语(China Coast English)"又称"英华英语(Anglo – Chinese English)"或混杂英语变体(hybridised varieties)。这些口岸英语与广州英语、上海洋泾浜英语一样,均不完全遵循英语语法规则,都只是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和政商活动而产生的皮钦英语,其词源语言是不标准的语言变体,是为了特定的交流功能,主要是商务功能而被简化的语言系统,因此当时的中国皮钦英语只是英语变体,而非英语国别体。从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随着传教士对正规英语的推广和官办英语教学的全面开展,中国皮钦英语逐渐淡出商业舞台。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英语在中国被几度边缘化,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外语的正规教学和研究受到严重损害,相应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也抑制了中国英语变体的演进。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人们意识到,中国必须借助英语这个国际通用语言进行对外交流合作和各种商贸活动,社会对人才的英语水平和能力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英语在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中国英语变体的生存空间也得到扩展。不久之后,学界便出现了关于中国英语变体的各种争论,这种争论最早始于 1980 年葛传槼先生在《翻译通讯》上发表的《漫谈由汉译英问题》,文中他提到了"中国英语"这一概念,随后学界对中国英语、中国英语变体、中式英语,特别是中国是否存在国别体英语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二、中国英语变体的语言生态学分析

(一)语言生态学简述

按照豪根(Einar Haugen)等一些语言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是借助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将语言环境与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研究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揭示语言的生态环境对语言生存、发展、演化的影响及其规律的学说,用以应对语言生态危机,维护语言生态的平衡和协调。[6,7] 语言生态学认为,如同生物系统有自己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一样,语言也有自己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这个环境主要包括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语言发展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态势等。语言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历经数千年,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历史变迁等对语言的演变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目前世界上存在的语言有 4000 多种,许多语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对应之处,按照这些相似点和对应之处,语言被划分为不同的语种、语族和语系,这就是语言间的谱系关系。如

同基础生态学的研究涉及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的梯级一样，语言生态学基础理论研究也可归结为由微观到宏观的梯级，即语言子系统—语种—语族—语言体系各个层面，这几个层面由左向右是决定关系，由右向左是影响关系。宏观层面的语言体系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会对语族即语种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语种间的关系主要研究语言生态系和语言进化律。[8] 语言系统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关系，语言生态学就是用生态学的视角研究这种关系，重点是研究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发展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寻求其中的运动规律。

语言生态学认为语言与它所处的生态环境构成语言生态系统，其中，语言生态环境包括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两部分，外生态环境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人群环境四部分所组成，内生态环境是指语言的各构成要素(语音、语义、词汇、语法)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组合。[9] 就如同自然环境的变化引起生物物种的变化一样，语言生态环境的变迁也会引起语言的变化。某一语言由于内、外部语言环境变化而产生了变异，会形成不同的语言变体。所有的英语新式变体面对新的种族及其他文化社会生态都能做出适应性的回应。变异是语言内部的重要社会生态因素，当外在条件改变时，它可能引导语言(变体)的结构产生新的发展方向，或者说在新的条件下，可能会有新的变体产生。[10](p184－185) 中国英语变体就是由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迁所导致的英语变异。豪根之所以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环境作隐喻类比，重要的原因在于，语言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取决于语言的生存环境，这类似于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生物的多样性同样取决于生物的生存环境；语言在社会环境中处于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化的动态平衡状态之中，这种动态平衡是由于各种语言既竞争又协同的结果，同样自然界各种生物也处于这种状态；语言具有显著的开放性，即很强的对外部世界的接受能力和交换能力，以保持、发展自身的生命和活力，自然界的生物系统亦是如此，各种生物之间同样保持着相互稳定、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此等等。[11](p27) 因此，用生态学及语言生态学的观点审视英语变体在中国的演替，将为探索中国英语变体与标准英语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世界英语体系中的位置和影响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二)生物多样性和英语变体多样性

语言系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语言包括语言变体的多样性，这种情况类似于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由于不同的自然气候、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共同作用，语言呈现出多样化的进化和发展形式，研究表明，生物物种多样的地区，其语言种类也呈现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是一个关于自然界多样性程度的广泛概念，是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有规律地产生、发展、变化所构成的稳定的生物与生态综合体，包括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多样性。其中，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主要是指地球上生态系统组成、功能的多样性以及各种生态过程的多样性，包括生境的多样性、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化等多个方面。生境的多样性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形成的基础，生物群落的多样化可以反映生态系统类型的多样性。语言生态学研究表明，语言和自然生态之间有很多共通点和可以类比之处，如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对语言多样化现象进行了观察和描述，认为语言的多样性与生物物种的多样性相似，语言也具有一切有机生命的本性。[12,13] 如同自然界中物种的不断演化而发生变异一样，英语作为一种语种，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它传播到非英语国家或地区时，也会发生变异，因而英语变体的出现在整个语言系统的演化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这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系统中语言变体的多样性。包括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牙买加英语等这些由殖民文化发展而来的用于国内交流的制度化英语国别变体，以及为了在国际上进行经济交流和文化传播而演化的区域性语言变体如日本英语变体，这就使得全球英语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这些带有各自国家或民族、地区特点的英语变体没有孰优孰劣之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以标准英语为核心的语言系统。语言生态学者认为语言系统可以被类比为一个生态种群系统，各种变体英语就如同是由标准英语变化和变异而形成的新物种。新语言变体的出现不仅不会消弱其共核语言，反而使整个语言系统更具生命力。

按照生态学理论,拥有多物种的生态系统,其异质性强,结构复杂,网络化程度高,物种间关系既竞争又互补,这种多物种间的相互补偿和替代关系为整个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正常交换提供了多种渠道,即使其中某个环节的平衡遭到破坏,通过其他环节,生态系统仍能进行正常运转,而系统的正常运转又能帮助修补和改进遭破坏的生态环节,实现生态系统又一轮动态的平衡,因此多物种共存的异质性强的生态系统是最强劲的生态系统。如果把这种理论引入语言生态系统中,则能解释为什么英语在全球语言生态中处于强势地位,进而发展为全球性语言。

当今中国的对外交流不只局限于和英美国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教育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作为世界语言的英语扮演着主要媒介的角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能够囊括所有文化,英语作为"世界语言",其"优越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现象和语言内部,它是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当今英语在国际交流中是标准化与多元化并存。[14] 多元文化和社会环境使得语言多元化和语言新变体的出现成为必然和现实。中国英语变体作为英语变体新物种,其语言特点鲜明,文化承载力强,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宣传和沟通角色。包括中国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变体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共核英语的生命力,反而丰富了英语语言系统的多样性,这必然促进共核英语的稳定发展,保证英语生态系统乃至整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

(三) 英语变体的竞争进化与协同进化

综合考察英语的发展和变化,在其进化、演变的过程中,它与其他的语种既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也存在着普遍的协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英语变体就是这种竞争与协同的一个产物,中国英语变体也不例外。众所周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生存竞争作为自然选择的方式促进了生物的进化。但是,如果把竞争对于生物进化的作用强调到普遍原则甚至绝对化的地位也是不恰当的。研究表明,生物之间还存在着更为普遍的协同现象,协同进化是生物进化更为普遍的方式。事实上,在生物的进化中,竞争和协同是一对无处不在的矛盾,二者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表现为相辅相成,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共同推动生物的进化。在生物学研究中,常常可以观察到,一个物种的进化必然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引起其他生物变化,这些变化又反过来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在很多情况下两个或更多的物种单独进化常常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适应系统。协同进化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以及物种的共同适应,并且维持着生物群落的稳定性。这种情况同样也符合语言演化和发展的过程。

德国历史语言学家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认为,有利的变种往往易于保持下来,而不利的变种往往易于消亡。不同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犹如动物之间的生死斗争,处于有利地位的语言得以保存,处于不利地位的语言走向消亡。[15] 英语为强势语言,有很强的吸收外来语言特点的能力,它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词汇,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没有阻止语言结构由于使用需要而进行简化,这使得英语更具环境适应性。而在另一方面,由说汉语的中国人所说的符合标准英语规范的英语也很难不带有任何汉语表达方式和思维特点,带有这些特点的英语就是中国英语变体。语言生态学认为,中国英语变体和标准英语是协同进化的关系,因为说汉语的人口数量庞大,和英语一样,汉语也是强势语言,带有汉语特点的中国变体英语由此携带了非常强势的中国文化基因。通过竞争使另外一种语言消亡,这对属于强势语言的英语,以及对带有强势文化、语言基因的中国英语都是绝不可能发生的,既然两者都无法、也没有必要淘汰对方,最好的演化方式就是协同进化。语言及其变体相互依存于同一语言系统,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该语言与其他语言的竞争,保持语言的活力,并实现语言发展性的演替。就像物种的协同进化一样,标准英语不断规范着中国英语变体,而中国英语变体也为标准英语提供了丰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通过不断吸收容纳外来语言特点,标准英语自身的生命力变得更强,中国英语变体在政治文化传播交流和商业贸易英语规范的压力下也会不断进化发展。

(四) 语言生态环境观和中国英语变体的开放性

语言生态学强调要为各种语言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语言生态环境观所要阐述的内容。如前

文所述，语言环境包括语言的外生态环境和内生态环境，其中外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社会、文化和宿主环境。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对英语变体在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前面已经说到，同自然生态系统是开放性的系统一样，语言生态系统也是开放系统。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每个生态子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与其外部环境进行能量、信息的传递和物质的交换。同理，语言系统也和其存在的环境发生着能量、信息的传递和物质的交换。每种语言都可以创造无限的词语和句子，看似静态的语言实际却是动态的，看似有限的语言实际却可以创造出无限的意义。通过与内部和外部环境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传递，语言也在不断演化。语言是文化和思想的载体，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可以囊括世界上所以的文化和思想，它必须借助其他语言的帮助来完善表达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这使得语言发展具有了广阔的空间。就算是汉语，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情况下，离开了外来语也不可能完整描述和表达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貌，比如汉语中的有些基本术语，‘政治’、‘政府’、‘方针’、‘干部’、‘抽象’等就是日语的舶来品，而这些词汇已经完全融于中华文化和社会生活。英语中的 tea（茶），silk（丝绸），typhoon（台风），Confucianism（儒家），cross talk（相声）等中文外来词汇也已成为英语常规词。语言生态学者们始终认为，语言系统是开放的、动态的。在语言系统中，标准英语和中国英语变体一直相互影响，进行着能量、物质和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这种系统运动使得标准英语和中国英语变体都拥有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然而，需要引起重视的是，语言虽然是开放的系统，但这并不意味这个系统对语言错误也是开放和容忍的。目前有人之所以对是否应该发展中国英语变体还抱怀疑态度，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英语变体外部生态环境的某些无序与混乱。文字污染和故意制造错误的英语都可能引起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误解和反感。比如现在网络上流行的“no zuo no die（不作就不会死）”这种表达方式是典型的人为错误英语，这种表达方式可能套用了“No pains no gains. / There is no gain without pain.”的结构形式，但完全按照汉语的语法造句，纯粹是为了语言效果而臆造的错误英语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在中国网民和媒体间广泛流传，中国人一读就懂，但对于英语为母语和外语的外国人而言则完全无法理解，混淆了中国英语变体和错误英语，加剧了人们对中国英语变体可理解性的担忧。我们应该对中国英语变体和人为错误英语有明确的区分，类似“no zuo no die”的错误英语是明知存在错误而故意为之，这既有别于中式英语——由汉语对英语的负迁移而产生的错误英语表达方式，更不同于中国英语变体填补文化中空的作用。

三、中国英语变体的发展展望

谈到中国英语变体的发展，就要提到生态语言学中的宿主环境，所谓宿主环境就是持这种语言的人群。有学者认为语言类似物种更像是寄生、共生物种。布朗（Brown 1995: 191）认为语言的生命与其宿主的分布紧密相关。如果一个语言使用者能说两种语言，他就会让一种语言系统成为另一种语言系统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这两个语言系统也互为语言生态环境，彼此间互相影响和作用。由于非母语较母语势微，母语的音系、句法、语义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非母语的使用。和自然界的生物演化规则一样，语言变体规则是随机变异和选择的无意义作用的累积，这种累积过程的主要作用力来自外部环境变化的压力，而语言使用者们的外部文化社会环境的一致性，使得其语言内部环境作用下的另一语言的变异方向也趋于一致，这种变异一旦形成系统，其运行将会产生规律性和理据性。语言变体的标准并不是由母语者制定，而是由长期使用该语言变体的非母语者制定。虽然使用语言变体的人在初始选择某种表达方式时存在随机性，但一旦这种选择被大多数使用者所接受，就成为了规则，大多数人接受这种表达是因为它既符合语言规范，又能确切表达内涵。很明显，这种表达的广泛使用，是言语演化中的进化而不是退化发展。因为它丰富了言语的多样性和共核语言使用的深度和广度，这对共核语言也是一种发展和促进。韩礼德（Halliday，2003）认为，标准语并没有固有的内在价值，如果标准英语的表达特征更受宠，那也无非是标准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14] 由此看来，就像生物为适应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化一样，中国英语变体也在适应着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而不断演化，如果中国英语变体通过这种演化也能形成

一套为使用者所能接受和理解的规则,那么,中国英语变体终将成为和南非英语、新加坡英语一样的英语国别体,也就是中国英语。

实际上,目前中国英语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中国特色英语。现在的中国必须对外开放和交流。中国有向外输出文化和消除世界各国对中国的陈见甚至偏见的迫切需要,但由于语言不对等和原有的空白领域等原因,中国在通过英语介绍自己时,必须构造一些新的表达方式。由于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别,有些特有事物和事件在标准英语中还未找到现成的对应表述形式,中国特色英语的出现弥补了这些空白。比如 imperial examinations(科举),one China policy(一个中国政策)等,这些表达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征,在对外交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中国新面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国外记者撰写的关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文章,其观察角度和逻辑思维都形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即使能够在一定层面上对中国文化和思想进行描述,但在很多情况下仍无法抓住精髓,甚至会引发误解和冲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何翻译"对外开放政策",西方媒体很长一段时间都使用"the open door policy"这一表达方式,但是这一表达方式实际上源于 19 世纪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所谓"门户开放政策"的产物,无论是在政治色彩上还是民族情感上,中国人都无法接受"the open door policy"这一表达方式,因此,中国的语言学者提出应将"对外开放政策"译为"the open - up policy"或"the open policy",目前这两种译法已被中西方媒体广泛采用。由此可见,中国特色英语的使用对中国英语变体的规范起着重要作用。英语在中国的本土化和英语的全球化使得中国英语变体向中国特色英语乃至中国英语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文秋芳(2003)认为,全球化的英语由两个层面组成,第一层面是英语共核层,是所有英语使用者共享的语言体系;第二层面是覆盖在第一层面之上的本土化英语层,包含各种英语使用者的地域、文化特征的语言体系。也就是说,准确和标准的英语并不是仅仅由内核英语使用者所规定的,而应该是被所有英语及其变体语言使用者都认同的。如果中国英语变体对词汇、句式的规定是准确的、规范的和可被理解的,那就应该获得标准英语的认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往不断深化和拓展,中国文化和汉语对英语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所以,中国需要一套带有本国标记的世界通用语言对外宣传和交流。只要做好中国变体英语的规范工作和宣传工作,则可以大胆预测,中国变体英语会最终发展成为国别体英语即中国英语。

参考文献:

[1] 邱 晨. 英语变体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 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6).
[2] 杨小青,张智华. 中国英语变体研究[J]. 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2).
[3] 戴卫平,孙旭东. 英语变体·语言文化[M]. 北京:科技出版社,2014.
[4] 顾卫星. "中国个体英语"的历史演变[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7).
[5] 邱志红. 洋泾浜英语小述[J]. 清史研究,2005,(2).
[6] 韩 军. 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综述[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
[7] 尹洪山. 语言濒危现象的生态学思考[J].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8] 黄知常,舒解生. 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9] 娜么塔,胡书津. 语言生态与双语教育[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10] 萨利科科·S. 穆夫温. 语言演化生态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1] 陈 茜. 大学英语教学生态系统简论[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
[12] 杨朝军. 生态语言学理论概述—兼论《语言:生态学视域》[J]. 外语教育,2008,(1).
[13] 陈立中,肖绍喜. 生态语言学的几个重要议题[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14] 张荣建. 未到尘埃落定时——英语变体研究的阶段性评述[J]. 山东外语教学,2008,(1).

(责任编辑:舒 娜)